《太平經》中的“所”字被動式*

胡 萍

內容摘要：“所”字被動式可能是由“為 A 所 V”式省略而成，也可能是“所”字所處句法環境整體性質的改變和漢譯佛典的影響，或二者兼而有之。《太平經》中有 8 例“A 所 V”且集中在庚部，更加可能是整理者受佛經語言廣泛影響後的自然表現。

關鍵詞：《太平經》 “所”字被動式 語言接觸 重新分析 庚部

《太平經》是中國道教的第一部典籍，較好地反映了東漢時期語言的真實面貌，是研究東漢語言極其寶貴的語料。本文着重對其中的 8 例“所”字被動式進行探討。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重新影印的明正統《道藏》本第 24 冊 pp. 311—601 為底本，並參考《太平經合校》和《〈太平經〉正讀》等的編校成果。文章先對“所”字被動式的認定及來源進行探討，而後對《太平經》中的 8 例“所”字被動式進行分析。

一 關於“所”字式

關於“所 V”式，劉景農（1958：16）提出由“為……所……”式省略而成的看法。朱慶之（1995）則認為與梵文原典被

* 華僑大學科研基金資助項目 07BS504

動形式的影響有關，而高列過（2003：30—31）不太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東漢佛經的‘所 V’式被動句，是受梵文原典的影響，還是受與之相關的西域語言的影響？一時尚難以斷定”下面分別對以上兩種意見作點評說。

1. 由“為 A 所 V”式省略而成

談論“所”字被動式就肯定要聯繫“為 A 所 V”被動式。“為 A 所 V”式顯然是從“為 (N) V”式發展來的。指稱式與陳述式在語用平面的相容性，導致它們可以互相轉化。從春秋晚期的“為 (N) V”到戰國末年的“為 A 所 V”，體現的也是由指稱式到陳述式（被動式）的轉變。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經常進入“為 (A) V”式的及物動詞祇有“笑、戮（僇）、禽（擒）”等少數幾個，而這幾個動詞所表示的行為在當時各國之間是經常發生的，這就使“為 (N) 笑/戮（僇）/禽（擒）”這種形式具有某種熟語的性質，指稱的性質比較明顯。而“所”字的介入使“為 (N) V”式用於陳述獲得了自己特有的形式，從而有了極大的自由，能夠進入“為 (N) V”式的及物動詞幾乎沒有限制，使能夠進入此式的動詞性成份呈爆發性的增長，而當“所”介入、能進入“為 (N) V”的及物動詞幾乎沒有限制時，“為 (N) V”差不多就成了“為 (A) 所 V”。“所 V”在“為 A 所 V”式中之所以表現出陳述性，也是有其內在原因的。“所 V”在形式上是類似於“所”字結構，但它與真正的名詞在概念內涵上是不同的^①。“所 V”是由陳述轉化來的指稱形式，它身上還帶有陳述的因素。可以認為，在“為 A 所 V”式中，“所 V”中的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它一般祇與受事有關，這一性質保證了該式祇用於受事主語句，並有了形式標記；二就是上述這種概念內涵上的陳述性，而它的指稱性則淡化乃至消失了。“為 A 所 V”中的“為”已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為”，“所”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所”，二者相結合共同轉化為真正的被動式（陳述式）

的標記^②。

“所”本為助詞兼有指代作用，“為 A 所 V”式中“所”字使用的直接原因是大量純粹動詞進入“為”字之後的位置，而“所”的添加是為了保持賓語的名詞性，是為了適應係詞“為”的表語從動名詞向一般動詞擴展的需要。因此“所 V”具有指稱性，“為 A 所 V”式中的“A”與“所 V”是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的關係。“為”字被動式經歷了主動式——繫動式——“為”字被動式的演變過程。當一部份“為”字繫動式用例轉化為被動式，“為”字可理解為被動標記，“所”後的及物動詞被理解為被動式謂語之後，“所”字也就轉化為一個能夠表示一定被動關係和調節語言節奏的助詞，“所 V”具有陳述性，“為 A 所 V”式中的“A 所 V”是一種主謂關係^③。

漢語有標記被動式形成的重要前提是句子的可分解性和句子成份搭配的靈活性。“所”、“見”和“而”等本來是表示一定語法關係的職能虛詞。隨着“為”字式的發展成熟，“為”字式變體中“所”和“見”字幾個虛詞往往共出並用，或根據需要添減，原有的語法功能受到削弱，其協調語言節奏的功能得到加強。同理，“為 A 所 V”被動式中的“為”本身也可視情況來決定是否保留。如果不影響被動意味的表達，又能起到協和語言音節韻律的作用，則“為”字也可省略。

當“為 A 所 V”成為典型被動式，“所 V”在“(受事主語) 為 A 所 V”式中就表現出陳述性，那麼“A 所 V”就相當於主謂短語，其中“A”雖還夾帶有一點領有性，但更多的是表示一種施事性。因為漢語無標記被動式不含標記，主動式與被動式的分別主要在於某個短語是否具備“受事者·主動動詞”這樣的內部結構，被動標記並不起決定性作用，所以我們偶爾可以見到這樣的結構——“(受事主語) A 所 V”，表示的是“(受事主語) 被 AV”的意思，“A”與“所 V”是主謂關係，“所 V”對“A”

進行陳述，“A”是施事者；“（受事主語）A 所 V”同時還夾帶一點這樣的意味：受事主語成了 A 所 V 的東西，“A 所 V”與受事主語具有同一性，二者具有某種對等關係。按照薛鳳生（1997），如果發話者主觀認知上覺得 A 跟 B 兩個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固定的、恒常的，那麼相當於英文中的一句“A is B”（A 是 B），用古漢語來說，就是“A，B 也”；如果他覺得二者的關係是暫時的、相對的，那麼他就會用“A 為 B”的形式。但是，中古時期在崇尚形式美的文風影響下，“為”也完全有可能或有必要刪除以協調音節。語言事實中就有這樣的例子^④。

2. “所”字所處句法環境整體性質的改變和漢譯佛典的影響

2.1 “所”字所處句法環境整體性質的改變

“所”在先秦的主要用法是與謂詞性成份組合，使其轉化成體詞性成份。這種用法的“所”字可以看作名詞化標記。秦漢以後，“所”字繼續作為名詞化標記外，又產生了一種新的功能，即表示被動。“所”字的這兩種功能不僅在出現時間上有先後，而且“所”字的表被動的功能是由其名詞化的功能演變而來的。這期間經歷了一個重新分析的過程。據董秀芳（1998）觀點，發生重新分析的句法環境是含有消極意味的、以擴展式“所”字結構“NP 所 VP”充當後項的判斷句。這種判斷句的前項，語義上相當於後項“所”字結構中動詞的賓語，其語義結構可表示為：受事—施事—所 VP。語義上的類同認知導致了結構上的類同分析，從而引起了語言使用者對整個結構的性質的認識的改變。“所”字被動功能的產生是由於其所處的句法環境的整體性質的改變促成的。當重新分析完成之後，語言使用者就把“NP 所 VP”當作表被動的一種句法格式來使用了。重新分析必須建立在足夠數量的語言材料的基礎之上，“NP 所 VP”表示被動，可能受了漢譯佛典的影響。

2.2 從語言接觸看漢譯佛典的影響

2.2.1 漢譯佛典的影響

據高列過（2003）說法，東漢佛經的翻譯者除嚴弗調外都是胡人，母語不是漢語，漢語是他們的第二語言，他們對漢語的理解、使用必然受原典的影響，有些句式的使用帶有中介語的性質。佛經語言的演變趨勢是迅速向漢語靠近，東漢佛經經歷了一個本土化並文言化的過程。34種東漢佛典中有“A所V(O)”式15例，約佔163例被動句的9.2%。從對勘的角度看，可以發現“A所V(O)”式是受原典影響的句法現象。朱慶之（2001：13）指出：“由於翻譯時採取逐字逐句對譯的方式，原典句子結構的影響隨處可見。”“所V”被動式就是在梵文原典影響下產生的^⑤。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選擇了“所”來對譯佛經原典的被動記號？高列過（2003）認為，選擇“所”對譯原典的被動記號，是受了中古最主要的被動句“為A所V”式的影響。筆者同意這個看法。上文“1. 由‘為……所……’式省略而成”已經提到“所”是表示被動的重要標誌，佛經翻譯者選用“所”，應該是基於這一點^⑥。同時，漢語承前省略的現象比較普遍，“A所V”被動式從形式上看是“為A所V”的省略，在具體的上下文中不大可能引起歧義，因而在漢譯佛經中長期使用。

漢譯佛經的語言面貌隨着時代的推移逐漸定型，漢譯佛經最引人注意的是它的新穎性。荷蘭學者許理和先生^⑦（1991，2001：295—296）認為，對曇花一現、充滿悲苦的“似水年華”的清醒認識是漢代末期的時代主題，因此作為個人獲救的一種激進的選擇，信仰佛教具有普遍性。中國在2世紀以及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社會上廣泛存在着各種鄉土文化、鄉土信仰和宗教活動。佛經術語中有許多漢語“對應詞”似乎借自某種未知的中國宗教傳說。早期漢譯佛經語言獨特，它並非來自任何先前的中國文學樣式，不但與標準的先秦文言不相同，而且與早期道教著作中相當規範的古典漢語有着令人吃驚的差異。在漢代末期的一些

城市中有一個由文史書役、底層官僚和商人、藝人組成的中間階層；這些普通的中國信教者祇是受過初步的學校教育、沒有進入上層文人圈子，但他們的文化程度已足以閱讀這種詞彙簡單、不加修飾的經文。深受口語影響又帶點文言色彩的粗劣的表達方式由於經常使用而日益被當成一種慣例，在3世紀，康孟詳的譯經已經形成了定型化的語言^⑥，中國佛教的“經典系統”——一種脫離於活語言的定型的佛經語言已經形成。佛經語言在術語和風格上的定型是幾種力量產生作用的結果：古典漢語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由於詩歌化句式的影響而造成的變形形式^⑥；散文和詩句交替形式本是印度原典的有機組成部份，這種強大的外國文學傳統一經傳入中國就不得不找到適合自己的表達手段，它必須加以調整來適應漢語的固有特徵^⑥——逐步漢化的過程導致了個性鮮明的漢語表達形式的形成。

從整體上來說，佛經是來自異文化的入侵者，而早期佛經風格是一個從異域傳入中國的“異己”文化形式逐漸被消化、中國化的過程，包含着明顯的層次。這個中國化的過程就是“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下面試用語言接觸理論來作點闡釋。

2.2.2 語言接觸對漢譯佛典的影響

鄒嘉彥、游汝傑(2004)認為，“語言接觸”是人類語言發展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研究語言接觸是研究語言演變的重要途徑，也是研究人類文化演變過程的一種方法。不同語言或方言本身不會接觸，而是要通過使用的中介人，通過書面或口頭互相接觸溝通的。語言之間的接觸既通過口頭交流的途徑，也通過文字翻譯的途徑。語言接觸最常見的結果是詞彙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語音成份和語法成份的互相滲透，從而改變語言的語音結構和句法結構。語言接觸是語言或方言演變和發展的原動力之一。

語言接觸本質上就是語言學習^⑥，學習的不同程度和深度直接關係到語言接觸的深度、廣度和結果。無論是獲得或習得的語

言，祇要是同時並存在一個人頭腦中的語言，都會發生接觸。因此，語言的接觸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存在於一個人頭腦中的兩種或幾種語言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⑤，另一種是指一個人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⑥，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接觸：前者涉及語言思維，後者則關係到語言態度。無論內部還是外部接觸，都會對接觸的兩種或多種語言產生影響^⑦；語言接觸而發生的語言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像任何語言變化一樣，是通過擴散實現的^⑧。也就是說，語言接觸具有擴散性：語言的接觸首先產生於社會的部份成員，接觸的結果則由部份社會成員逐漸向全體成員擴散。接觸產生於社會部份成員的學習，而並不需要所有使用乙語言成份而操甲語言的人都必須首先學習乙語言。可見，語言接觸的產生和接觸結果的使用不是一回事。另外，語言接觸具有中介性；從結果來說，目的語受到基礎語影響產生的中介狀態會發生“固化”，原來的非穩定狀態變為穩定狀態，成為目的語的一種變異或變化形式^⑨。

在兩種存在巨大差異的語言之間進行翻譯是高難度的，因為翻譯人員基本都是祇熟悉源頭語言或目的語言，因此東漢佛經的語言面貌有中介語（interlanguage）的色彩^⑩，其原因是東漢譯經者習得純正漢語的可能性很小。首先，東漢譯經者學習漢語的年齡過了“側化期”（lateralization）^⑪。現有材料證明，東漢佛經翻譯者除嚴弗調、康孟詳情況特殊外，應當是在過了學習語言的“側化期”之後學習漢語的^⑫。其次，東漢譯經者沒有受到良好正規的漢語教育。正規的第二語言教學是掌握目的語的重要途徑。東漢譯經者主要是通過實際的語言交流習得漢語，沒有資料表明這些譯經者從小受到良好的、正規的漢語教育。而即使有正規的第二語言教學，成人的第二語言學習中，錯用目的語的情形還是比較普遍的^⑬。可以推想，在沒有正式的第二語言教育與學習的情況下，要習得純正的漢語是非常困難的。

儘管我們要考慮個人的語言學習能力，但語言習得的過程具有共性。在佛經翻譯剛剛開始的東漢，佛經翻譯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漢語）的時候，母語的干擾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們不可能接受規範的第二語言教學。這些都對他們習得純正的漢語構成障礙。再加之佛經的翻譯克服的不僅是語言的障礙，更有文化的差異，因而東漢佛經語言具有中介語性質的成份是必然的。不過安世高、支讖以後，佛教的傳播逐漸廣泛，西域語言與漢語的接觸、瞭解也日益增多，支曜之後的譯經者漢語水準應當比較好；同時，在安世高、支讖的大量翻譯之後，佛經翻譯也積累了一些經驗，譯經語言開始規範起來。

東漢佛經翻譯，擔任主譯的外國來華傳教僧人多是粗通漢語，卻先要由他們用受了母語很大影響的“洋涇濱”漢語將經典大意逐句翻譯出來，再由擔任助譯的中土僧人適當潤色。“硬譯”不可避免，譯文中肯定就會出現許許多多不合漢語習慣的漢外混雜型的語言成份，其中詞彙方面佔重要的部份，語法方面佔次要的部份，“所 V”式被動句就是後者的具體表現之一。據朱慶之（1995），漢譯佛典中隨處可見“……所 V……”這類句式，說明這是一種很普遍的語言現象；而通過對漢梵佛經材料的對勘可知，這種句式應是原典語言^⑥影響的產物：大凡帶有被動標記的梵語詞都被譯成了“所 V”。如果把“所 V”看成原文被動態謂語動詞“完整”的漢譯，那麼其中“所”這個字就是原文被動記號的漢譯；原文當中並沒有有一個與漢語被動句裏引出施事的介詞“為”相當的部份，所以地道漢語必須使用的這個“為”也就不一定非得出現了，結果是漢譯佛典語言中就產生了大量的漢外混合型的“所 V”被動句式。

漢譯佛典中存在許多不合漢語習慣的漢外混雜型的語言成份（包括“所 V”被動句式），這種漢外混雜型的語言成份其實就是語言接觸的產物；詩歌化句式的形成，不是漢語慣有風格對形成

中的佛經慣用法單向滲入，而是受原典語言表達形式刺激而發展起來的新型風格載體。漢代末期信仰佛教具有普遍性，社會對漢譯佛典的需求量較大^②，這使得這種不合漢語習慣的漢外混雜型的語言成份很快擴散開來，而它不能不反過來對漢語產生影響^③。

二 《太平經》中的“所”字被動式

高列過（2003）認為中土文獻不見“(A)所V”式。事實不是這樣的。該式用例確實較少見，所舉例一般是《淮南子·說林》：“嗜欲在外，則明所蔽矣。”其他中土文獻中可能還有用例，祇是我們沒有充分發掘而已。《太平經》中就有“A所V”被動式8例^④，如：

(1) 大惡之家，無大小，鬼神所憎。（卷一百十二《七十二色死尸誠》，五六〇上）

(2) 思行天上之事，神靈所舉，可得仙度久生，長與日月星辰相親……（卷一百一十二《七十二色死尸誠》，五六〇中）^⑤

(3) 不者罰謫賣菜都市，不得受取，面目為醜，人所輕賤，眾人所鄙。（卷一百十二《寫書不用徒自苦誠》，五六一上）

(4) 部吏正卒此（比）伍特（持）至曠野不潔之處，繞得被土，狐犬所食，形骸不收，棄捐道側，魂神俱苦，通（謫）作不息。或著草木，六畜所食，何時復生？（卷一百十二《寫書不用徒自苦誠》，五六二上）

(5) 走行乞匄，復諸神靈，其神怒之。猛獸所食，骨肉了已，狐狸所齧，不歸故鄉。（卷一百十二《有過死謫作河梁誠》，五六三上）

這 8 例都是四字句式，句式整齊，音節節奏基本是 (1+1) + (1+1) 的二二式。

8 例中，有 7 例是表“逆意”的，感情傾向以消極意義為主^①。

8 例“A 所 V”全出現在庚部，比較集中；而且，明正統《道藏》共 290 頁，該 8 例“A 所 V”集中出現在 3 頁（五六〇—五六三）。

《太平經》中“A 所 V”8 例，句式整齊、以四字為主的，出現在以勸戒、說教為主的庚部。這也許是早期漢譯佛經“詩歌化的固定格式”對漢語的“反滲入”。“語法結構的滲透往往是相互的”^②，“滲入”也就不是單向的，漢譯佛經已在中國廣為流傳，其語言風格影響《太平經》，這種可能不是沒有^③。或是一股“合力”使然：其一是早期漢譯佛經“詩歌化的固定格式”，其二是漢語的審美要求、世俗文學四字句式的文學背景，其三是漢語自身發展、語言使用者“擇善而從”。這三股力形成的“合力”，對《太平經》（尤其是庚部）編纂者的語言產生一定影響。

同是宗教，為了傳教、為了被更多的人接受，佛道語言勢必互相吸取、相互借鑒，取長補短^④。另外，據林富士（1998）考證分析，《太平經》在六朝時曾經散佚，後來可能經過南朝末年的茅山道士重新整理、編輯，因此，若干篇章或段落（限於說教體和會話體）有可能是出自六朝道士之手。如果此說可信的話，則《太平經》中的“A 所 V”更加可能是整理者受佛經語言廣泛影響後的自然表現。

一般認為“所”字被動式僅出現在佛經譯文中，《太平經》中的該類被動式可謂對此觀點的一個修正。

〔注釋〕

①“所 V”的功能在現代漢語中被“的”字結構所繼承（朱德熙

1983), 因此, 朱先生對“的”字結構的如下一段分析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把握“所 V”的性質。朱先生(1978)在說明“小王是第一個跳下水去的”和“第一個跳下水去的是小王”這兩個句子時指出:

當我們說這兩句話的時候, “小王”和“第一個跳下水去的”在事實上是同一的, 即同指一個人, 可是“小王”和“第一個跳下水去的”這兩個語言形式表示的概念則完全不同。“小王”是指稱的對象, “第一個跳下水去的”則是從內涵上對這個指稱對象的陳述。從語言形式着眼, “小王”可以叫指稱形式, “第一個跳下水去的”可以叫分析形式。

這一分析也完全適用於古漢語中的“所 V”結構。參看姚振武(1998)。

②這一點還可以得到以下事實的證明, 即其中的“為”可以由“被”來取代, 形成“被 N 所 V”式。這一事實大致發生在六朝末(唐鈺明 1987)。作為被動式, “為 N 所 V”式與“被”字式完全一樣, 而“被”字式更具活力。至唐代, “為 N 所 V”式就完全由“被”字式取代了。如果“所 V”還是表指稱而不是表陳述, 那麼這種替換不可能發生, 因為“被”與表指稱的“所 V”在語義選擇上無法相容。參看姚振武(1998)。

③參看太田辰夫(1958: 227)、柳士鎮(1992: 323)。

④例見下文“二、《太平經》中的‘所’字被動式”。

⑤胡敫瑞(2005)也認為: “好用音節助詞‘所’是佛典用語的一個特點”, “所”在上古漢語中雖可放在動詞(或動詞詞組)前, 與其後附的成份構成“所”字結構, “所”是個具有指代意義的特殊代詞, 這種“所”可以和動詞(或動詞詞組)構成一個“小讀”, 而“佛典中‘所’字這種特別的用法, 是譯者不諳漢語的誤用呢, 還是受了原典語法的影響? 這個問題還有待於繼續研究。但是不管怎麼說, 佛典中存在不少音節助詞‘所’的用法是一個事實”。

⑥這與梵文原典的絕對分詞在漢語中以“已”對譯在道理上具有相通之處。蔣紹恩(2001)指出, 儘管漢語本有的“已”在對譯梵文絕對分詞之後性質發生了變化並被漢語接受, 但我們認為, 接受的前提是對譯絕對分詞的“已”與漢語本有的“已”在意義上接近。蔣

氏的論述注重系統描寫，從系統內部說明了佛經“V已”式結構的由來、特點和發展。

- ⑦荷蘭學者許理和先生對漢譯佛經很有研究，其著述（1959、1977、1991）先後被李四龍、蔣紹愚和顧滿林翻譯、介紹到中國。《最早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份》和《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都是從語言學的角度著筆，很有參考價值。
- ⑧高列過（2003）認為，安世高和支謙的譯經佔東漢譯經的絕大多數，他們的譯經的行文格式沒有“四字一頓”的特點，反映口語的程度比較高。俞理明（1993：33—34）指出，受東漢晚期中土文獻喜用四字句的影響，東漢佛經從支曜開始大量採用四字句。康孟詳以後，四言成為譯經的常體。
- ⑨衆所周知，二三世紀的中國散文明顯地傾向於用四言句。例如，當時荀悅（200）的世俗作品《申鑒》中四言句佔全文52%，而三言句祇佔17.3%，五言句佔15.5%；在一些佛經中，四言句也達到了同樣的比例，而且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隨着中國化的“佛經風格”的發展而有明顯的增長。
- ⑩由於梵語原文的影響，最初的譯者們顯然被動地處在這種外來文化“侵入”的影響之中束手無策，隨後的幾代譯經者逐漸借用了中國文學風格上和結構上的一些特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散文中越來越多地運用詩歌化的四言句式，而這種句式是當時世俗文學的主要句式。
- ⑪嚴格來說，語言的學習分兩種：獲得和習得。人類學習語言是分等級的，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非常重要的等級：非系統學習和系統學習。系統學習至少還可以分為非熟練學習和熟練學習——其實，這是指學習的程度和深度。
- ⑫這是指結構層面上的接觸，即語言內部的接觸。
- ⑬這是指應用層面上的接觸，即語言外部的接觸。
- ⑭儘管這種影響的性質不同：內部接觸產生結構上的影響，比如成份或手段的借用或滲透，甚至規則的改變，系統和結構的變化，直到兩種語言混合產生一種新的語言；外部接觸產生應用上的影響，比如產生語言兼通現象，即雙語或多語現象，語言兼用和換用現象，

即一部份人或全社會成員放棄使用自己獲得的語言而使用另一種習得的語言。

- ⑮參看董志翹（2000）。
- ⑯語言教學重視基礎語對目的語影響形成的中介語，而語言理論研究更關心目的語對基礎語的影響所形成的基礎語的“變異”或“變化”形式，因為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言系統。參看瞿霽堂（2004）。
- ⑰即語言學習者在尚未掌握目的語而努力向目的語靠近時創造出來的一個系統。參看趙賢州、陸有儀主編《對外漢語教學通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
- ⑱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認為：“成年人學習第二語言時主要依靠認知機制，而兒童則更多地借助語言習得機制。這裏涉及‘關鍵期假設’（critical hypothesis），即人的一生中有一段固定的時期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容易習得語言，過了這段時期以後，一般很難習得完美的母語。這段時期與大腦的‘側化期’基本吻合。所謂側化期就是大腦的語言功能在大腦左側建立起來的過程，在這段時間內，大腦還處於發展階段，具有可塑性。據此人們推斷關鍵期大約在0—12歲時結束。”見Diane Larsen—Freeman and Michael H. Long著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導讀·第六章》第30頁（《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概況》，蔣祖康導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年。
- ⑲朱慶之（2001：10）也指出：康孟詳是僑民，“會說地道的漢語應當沒有什麼疑問……但他在特殊的外來移民（大部份是商人）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在漢文化的素養上與受過嚴格傳統文化訓練的本土士大夫相比肯定會有一些差距。”
- ⑳魯國堯（2000）指出：“我們在批改外國留學生的作文時會發現，他們往往利用類推率或因其他原因造成某些不見的詞兒和語法格式……以今例古，在古代外籍人士撰寫的漢文語料中，發現異於一般的現象，似乎不宜立刻都看成俗語詞或俗語語法現象，還要考慮到作者是否錯用了漢語。”參看魯國堯（2003：670）。
- ㉑漢譯所據佛經原典均為印歐語所作，主要是梵語。梵語的被動是一種“態”而不是漢語的“式”，即漢語被動用特殊的語序和特定的虛

詞構成一種特別的格式，而梵語祇是在其謂語動詞後“黏”上一個特定的“記號”作為被動標記，而與其他因素沒有直接的關係。

- ②道安認為最初的40年間就譯出了大約70卷漢文佛經，表明當時中國有足夠多的“用戶”來支持這種行動。參看《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荷蘭萊頓大學許理和（Erik Zürcher）1991年著、四川大學中文系顧滿林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四輯第301頁，巴蜀書社2001年。
- ③語言接觸有方向性。接觸的方向性決定於學習的目的性、應用的頻率、熟練的程度和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支持。基礎語影響目的語從來就是語言教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目的語影響基礎語，歷來不受重視，祇作淺層級的研究，如一些語詞、個別語音和語法成份的借用或滲透等。事實上，目的語影響基礎語纔是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因為它涉及語言的共時變異、歷時變化和發展演變的規律。具體來說，如語言系統和結構改變的原因、語言的發生和發展、混合語的產生、語言的識別和方言的劃分等重大的語言學問題，甚至語言思維等涉及語言哲學的問題。參看瞿鷹堂（2004）。
- ④如果對“A所V”式是否表被動有疑問，後文例（5）的上文可幫助消除這一疑問。“此念恩不忘，為天所善，天遣善神常隨護。”“不但天愛之也，四時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天上名之為孝善神人，皆為神所敬。”其中“為天所善”、“為神所敬”都是公認的被動結構。
- ⑤該例的上下文分別是：“得天應者，天神舉之；得地應者，地神養之；得中和應者，人鬼祐之。得善應善，善自相稱舉；得惡應惡，惡自相從。”“貪生者天之所祐，貪養者地之所助，貪仁者人共愛之，過此而為惡，必得賊。……天貪人生，地貪人養，人貪人施，為惡其禍不救。”可幫助理解。
- ⑥據董秀芳（1998），“所”字表被動的功能是由其名詞化的功能經重新分析演變而來的。發生重新分析的句法環境是含有消極意味的、以擴展式“所”字結構“NP所VP”充當後項的判斷句。《太平經》中“A所V”被動式以表逆意為主，這與董氏觀點相互印證。
- ⑦參看唐鈺明（1988）。

- ⑳黃增壽(2005)認為：“‘甚大’作狀語能在中土文獻中出現，是佛經語言現象‘直接移植’的結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漢語，則是因為與漢語的語法規則有抵觸。”借鑑他的觀點，《太平經》中的“A所V”可能是一種結構形式的“直接移植”。
- ㉑20世紀末期，《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曾經以“佛教從道教中吸取了什麼”和“道教從佛教沒有吸取什麼”為理念，推出了一冊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專號。這反映出佛道的互相影響是存在的，甚至是大範圍、大面積的。

〔主要參考文獻〕

- [1] Diane Laresen-Freeman and Michael H. Long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概況》), 蔣祖康導讀.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2] 董志翹.《高僧傳》詞語通釋(一)——兼談漢譯佛典口語詞向中土文獻的擴.《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 成都: 巴蜀書社, 2000.
- [3] 董秀芳. 重新分析與“所”字功能的發展. 古漢語研究. 1998 (3).
- [4] 高列過. 東漢佛經被動句疑問句研究, 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3.
- [5] 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 [6] 黃增壽. 翻譯佛經中作狀語的“甚大”. 中南大學學報. (社科版). 2005 (2).
- [7] 林富士. 試論太平經的主旨和性質. 臺灣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69本第2分冊, 1998.
- [8] 劉景農. 漢語文言語法, 北京: 中華書局, 1994.
- [9] 柳士鎮.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 [10] 柳士鎮. 試論中古語法的歷史地位. 南京大學學報. 2001 (5).
- [11] 魯國堯. 欣喜·憂慮——序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 // 董志翹.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1-15. (又語言研究 2001 (1); 另載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 [12] 金春峰. 讀《太平經》. 齊魯學刊 1982 (3).
- [13] 瞿霽堂. 語言思維和語言接觸. // 鄒家彥, 游汝傑主編. 語言接觸論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 [14] 宋紹年. 古代漢語謂詞性成份的指稱化與名詞化. // 郭錫良主編. 古漢語語法論集.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8.
- [15] [日] 太田辰夫著.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 蔣紹愚, 徐昌華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 [16] 湯一介. 關於《太平經》成書問題. 中國文化研究集刊, 1984 (1).
- [17] 唐鈺明. 唐至清的“被”字句. 中國語文. 1988 (6). //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唐鈺明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8] 王 明. 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世界宗教研究. 1982 (1).
- [19] 王 平. 〈太平經〉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5.
- [20] 許理和 [荷蘭] 1991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Texts (《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 顧滿林譯.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四輯).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
- [21] 薛鳳生. 古漢語中的主語省略與所謂的被動句型. // 黃正德主編. 中國語言學論叢 (第一輯).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1997.
- [22] 姚振武. “為”字的性質與“為”字式. // 郭錫良主編, 古漢語語法論集.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8.
- [23] 俞理明. 〈太平經〉正讀.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
- [24] 張延俊. 漢語被動式歷時考察. 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 [25] 朱德熙. “的”字結構和判斷句.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0
- [26] 朱德熙. 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標記“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 方言. 1983 (1).
- [27] 朱慶之.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2.
- [28] 朱慶之. 漢譯佛典語文中的原典影響初探. 中國語文. 1993 (5).
- [29] 朱慶之. 漢譯佛典中的“所 V”式被動句及其來源. 古漢語研

究，1995（1）。

[30] 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2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1] 朱慶之編．中古漢語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胡萍 華僑大學文學院 郵編：362021）